

余杰◎著

余杰书系/新作

我的梦想在燃烧

My dream is burning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 光是如何灼痛自己

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湘江，更加接近天空的地方

教师与士兵

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消失

当代世界出版社

余杰 / 著

我的梦想在燃烧

My dream is burning

1067
Y755

时代
阅读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梦想在燃烧/余杰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115-805-9

I. 我... II. 余...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762 号

书 名: 我的梦想在燃烧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115-805-9/I·148
定 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一九七三年十月，生于四川成都平原一个美丽的小镇。十三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中学时代发表各类作品十余万字，并多次获奖。思想早熟，承接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余绪，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一九九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零零零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北大求学期间，创作近两百万字的文化评论和思想随笔。一九九八年，部分作品结集为《火与冰》出版。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大背景下，该书对北大现状及中国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尖锐批判和深切反思，立即在读者和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被视为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批评立场和独立精神回归的标志之一。该书迅速风行大学校园，印行近百万册。

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文化批评、时政批评的写作，同时尝试小说、游记、报告文学等跨文体写作，并继续近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学术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作品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处女作《火与冰》被席殊读书俱乐部评为一九九八年“十大好书”（文学类）之一；社会评论《为自由而战》获《亚洲周刊》（英文版）“二零零零年度最佳评论奖”；二零零二年获纽约万人杰基金会之“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零零三年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二零零四年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法国文化部访问学者。

现为独立写作者，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理事。

图书策划：北京·阅读时代图书

E-mail: nsc@bw168.com

责任编辑：许苏江

封面设计：耀午书装 010-84473188

目 录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 2

学术的虚妄 / 7

北大的俯就 / 12

遥远的掌声 / 16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 19

教师与士兵 / 22

教师与总统 / 25

残忍的快乐 / 29

梦想的勇气 / 32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 35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 38

没有童年的“名模” / 41

欲说还休的“语文” / 44

作文岂能“爆破”? / 47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 50

真假文凭与信誉社会 / 54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络时代的阳光 / 58

我们为什么不会游戏? / 62

告别战争语言 / 66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 72

高勤荣,你在哪里? / 76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 82

国宝、巨款与爱国主义 / 87

“狐狸洞”与“包二奶” / 91

无耻者无畏 / 97

网络上下的“杀人” / 100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 104

斯德哥尔摩的沉船 / 109

凤凰城里的“老先生” / 112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 114

陈寅恪的故居 / 118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 121

城市的灵魂 / 124

丽江,更加接近天空的地方 / 128

人生三境 / 134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 136

——写给先锋书店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

乡村生死场 / 142

——序许宏泉《乡事十记》

爱,直到受伤 / 146

——序曹莹《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哪个文人不帮闲? / 150

——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知识”与“分子” / 155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巨人是这样生活的 / 159

——读钟肇政《史怀泽传》

发现真正的“苏东” / 163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朝圣者的容颜 / 168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 / 172

——读奈保尔《河湾》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 / 178

——评陶涵《蒋经国传》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 / 188

——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 192

——读福山《信任》

戴着镣铐的写作 / 196

——从虹影小说《K》说起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 / 201

——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光如何灼痛自己 / 205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青春有悔 / 209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不再彷徨 / 212

——评画家汪志望作品《擦肩而过》

何处寻找安慰? / 216

——评摄影家周传荣的系列作品

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 / 220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教
师
与
士
兵

第
一
卷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近几年来，中国各大高校之间兴起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合并风潮”。最近一次倍受瞩目的合并是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这一合并受到教育部门高级官员的嘉许，国内传媒也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进行报道。

“以大为美”在高等教育界形成一时之风尚。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市的若干所院校，号称中国大陆学科体系最齐全、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重庆大学与重庆建筑大学合并、武汉大学与同济医学院合并、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等等，也都引人注目。有的城市，由合并进而引发几所老牌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例如在武汉两所规模最大的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分别吞并了好几所专业院校，企图在“蚕食”中壮大自己、压倒对方。另外的一些城市里，则出现了一所大学“独占鳌头”的局面，例如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就在策划吞并位于同一城市的大部分院校，从而使得自己在广州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某些城市里，干脆将原有的一大批二流学院全部合并成一所庞大的大学。比如新成立的上海大学，就因为合并了数家专业院校而突然就膨胀成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宏大的大学”。

然而在我看来，就合并而言，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利弊并不一样。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算是“水到渠成”。因为在五十年代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之前，北医大就是北大的医学院。两校之间渊源深厚，近年来也合作亲密，北大生物系与北医大某些学科实行共同招生。此次合并有利于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相反，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不久前召开的一

次政协会议上,就有教育界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工艺美院需要自由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它的教学与清华严谨务实的校风迥然不同,生硬地将两校合并在一起,丝毫起不到互补的结果,无异于“拉郎配”。两所学校一所在城市的西北,一所在东部,相隔数十公里,“统一管理”显然不现实,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合并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呢?

据说,天津市正在策划将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合并。其他地区依靠大学合并,已经让自己省区内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排名靠前的不少。如果天津再不合并,两所名校“单打独斗”,则难以挤入全国前十名。所以,地方领导便异想天开地拿出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来。然而,有学者却声称,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官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雄厚;而南开大学的前身则是以文理基础学科为特色的私立大学,两校在历史、性质、校风、发展方向等方面均“风马牛不相及”,强迫它们在短时间内合并,就好像将不同血型的血液强制输入一个人的体内,必将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使得两所学校的特色和传统都受到严重伤害。可以说,当一所“四不像”的“巨无霸”产生的时候,也将是两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老牌大学“寿终正寝”的时候。

隐藏在盲目的合并行为背后的,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大学是否越大越好?合并所带来的结果究竟是“一加一大于二”,还是“一加一小于二”? (这道连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都会回答的算术题,放在此处,我们的教育专家们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将答案脱口而出)我想继续我的追问:第一流的学术水平难道真的能够在简单的合并中产生吗?仅仅进行名义上的合并而没有教育理念上的深刻变革和教学体制上的全面更新,中国的大学就真能够“超英赶美”吗?盲目扩招和大学合并,是否又是一轮新的“教育大跃进”呢?

中国的大学当然需要变革,但胡乱的合并非上策。今天的大学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重新建构大学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恢复民国时代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足鼎力的格局,让各类大学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焕发出生机和活

力。同时,建立起一个由研究性大学、地区性大学、人文学院和社区学院等共同构成的、立体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大学和学院各自吸引不同层次的生源,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

显然,比合并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学者丁学良对大学制度的建设有一番精彩之论。他认为,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制度,有几个核心的部分。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或是公私共建的大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之前,中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这就像没有银行法就不可能有现代银行制度,没有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制度一样,如果没有“大学法”或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大法律环境后,创办大学的第一步,得有这所大学自己的“宪章”。这宪章就是这所大学的基本法,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小改动都要通过严谨的程序。宪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参照了本国相关的法律架构,也参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学的宪章,同时也应该参考本大学目标所瞄准的国际上那几所最好的大学的宪章。第二步,从组织架构看,大学必须要有校董会。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要有校董会,其成员有的来自政府或立法机构,但更多的来自社会贤达,还有一部分是本大学的最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他们是本社会具有很高威望的公众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专业成就的人。校董会并不参与大学的实际运作细节,但每年都要开多次正式的会议,对大学的方向和重要举措进行监督、指导和规划。校董会不是政府某一部门的附属,而是由具备社会公信力和学术界高等职位的人士组成的该大学的监领机构,具有法律保障的独立自主权限。

“大学之大”,确乎不在于建筑之大、面积之广(还有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级别之高”——不少北大学生就以北大是惟一的一所“副部级大学”而洋洋得意),也不在教授和学生人数之多,更不在资金的充裕、实力的雄厚。“大学之大”乃在于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的程度。而要拥有真正的学术独立和教育自由,必须要有法律切实而严密的保障。否则,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像是“巨无霸”的大学,因为内部并没

有钢筋铁骨的支撑,往往风雨未来而根基先垮。近年来,经过一番或者是“水到渠成”、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合并,中国的确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巨型大学”来。但是,哪一所大学不是按照衙门的方式来构架的呢?在这些学校里,党政及后勤系统之庞大举世罕见,而真正从事教学科研的职位却受到严格限制。“无法”自然就导致“无天”,大学成了一个人人都想扑上去啃一口的大蛋糕。这一艘艘“负债累累”的“航空母舰”究竟能够行驶多远呢?

没有制度保障,也就没有大学精神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认为,与其由主管部门“乱点鸳鸯谱”大肆合并,不如老老实实在静下心来完成制度建构和权力转移。对比西方成熟的大学制度,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正如丁学良所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由法定的宪章保障。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那些患上了“合并癩”的教育官员们,真该听听丁学良的真知灼见。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合并,并非合并减少了官僚的职位,恰恰相反倒是增加了官僚的职位——在原有的各所大学的组织建构上面,又增加了一层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怎么会放弃大学“衙门化”的努力呢?

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权力社会,大学当然也不可能是一块“净土”。权力的干预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不改变这种状况,北大清华永远也赶不上哈佛。哈佛大学何以成为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特别指出:“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根本没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学教授或医学教授,他们根本没有权力为他们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

佛大学指手画脚。”然而,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没有哈佛的独立地位。连校长都是由“上面”指派的,惶论教授呢?同时,今天中国的大学还日益受到金钱的侵蚀。那么,在更加商业化的美国,哈佛的处境如何呢?劳伦斯·萨默斯指出,不仅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学术研究,即便是大学的赞助人和投资者也不能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你可以到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个数学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大学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这个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而且我们也曾经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把你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认为,要理解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这是创办一流大学最基础的东西。”而在中国,这种“创造智力卓越的源泉”依然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压抑与摧残。北大清华等名校也开始放下架子,大肆给官员和富商发送文凭和学位。短期之内确实有丰厚的收入,但伤害的却是大学的尊严和声誉——以后再想挽回就困难了。

大学的大和小,与学术水准的高与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欧美不少一流的学院,规模其实并不大。按我们的标准来看,简直就是“袖珍学校”。但是,人家的学术水平却让我们望尘莫及。据说,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合并计划的是一位留学回来的所谓“教育专家”。此人对国内高等教育的现状并不了解,对欧美大学教育的精髓也没有深入的体会,他仅仅是凭借自己在西方学到的一点皮毛,就希望对中国高校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我看来,其结果只会是“缘木求鱼”。

今日之教育界,普遍沉浸在“打造航空母舰”的热情之中,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去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中国连一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都没有(据国际权威调查机构评估,北大和清华的学术水平排在世界前两百名之后),某些领导人却异想天开地宣布:今后几年之内,要在中国建设起一百所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来。高等教育界的“大跃进”,在短时期内可能显得轰轰烈烈,但若放长眼光,其隐患则让人担忧。

学术的虚妄

我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失望之感离开学院的，尽管我就读的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近十多年来，即使是北京大学也笼罩在浓重的“学术的虚妄”之中，让我“艰于呼吸视听”。

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经济学成了一门“显学”。北大的许多经济学方面的教授，躲在书斋中炮制一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并认为它们能够打动政府和拯救民众。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无所知。他们“食有鱼、出有车”，从来没有乘过地铁、从来挤过公共汽车，也从来没有到肮脏的菜市场买过菜。普通老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有一位名声显赫、频频在电视上露脸、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的年轻经济学家，原本出身于西北某偏僻山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然而，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之后再回国来，俨然就成了一尊背后闪烁着金色光环的佛像。早年的苦难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现在他的学术“只对上、不对下”。他精心编织论文为腐败辩护、为“权力寻租”辩护。至于那些箱子里压着厚厚的白条的农民、那些被抛出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被凌辱和被漠视的灵魂，这位经济学家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的学术研讨会都在五星级的大酒店里召开，这就叫“与国际接轨”。

如今，经济学成了北大文科的“代表”，许多刚刚进入北大的高中毕业生看到热火朝天的经济学科，便以为这才是“北大精神”。考入别的系科的学生纷纷要求转入与经济学科相关的专业，以便能够迅速“成才”（也就是获得升官发财的秘诀）。

大学里发表论文的多少成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准的惟一标准。而

那些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那些被学生们奉为圣旨和经典的论文,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呢?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中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张五常的许多学术观点我并不同意,但他的这段话却“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的最后一句话肯定会得罪很多同行,说这样的话确实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小孩说真话是出于天性,而对于一个“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成年人来说,要说真话却必须克服诸多利益的权衡和考量。

同样道理的话,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教授也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说过。穷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张梦阳整理、搜集、编写了上千万字的、多卷本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然而,当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之后,他不仅没有得意洋洋,反而在大会上心情沉痛地说:“这些论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一语惊四座,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是圈子中人,他们的脸面都相当地挂不住。

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彻底丧失了。拿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高校,显然是南辕北辙。学者丁学良尖锐地指出:“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丁学良所批评的情况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以上种种丑闻在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里也屡见不鲜。

北大固然历史悠久，但这种悠久的历史也养成了某种难以去除的惰性。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位教授拿着一二十年以前准备好的、纸张都已经发黄的讲义来照本宣科。由于他上的那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全系的必修课，上百个学生都得苦苦坚持整整一个学期。有同学在课下发牢骚说：“听这样的课简直就是坐牢！”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境况。第二年，这位教授又用同样的方式去教授下一届的学生去了。还有一名教授，在与研究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训斥说：“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我指导你，首先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你，其次才是学者的标准。你要记住，你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二身份才是学者。如果你的论文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我绝对不让你通过！”紧箍咒一戴上，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学问来呢？这样的教授、这样的课程在北大绝非“凤毛麟角”。许多著名教授的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远远不能与其名声成正比。看看这些年来多如牛毛的种种教材吧，其中究竟有几种版本中发现了新的材料、新的史实并提出了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来呢？就以各个大学都在争先恐后地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论，绝大多数都是互相抄袭、移花接木、机械拼贴。这些教材能够称作是“学术成果”吗？它们只能贻害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有的学者抱着“随大流”的心态进入到“学术界”之中——既然大家都是如此，我也只好随波逐流了。既然“傍官僚”和“傍大款”成为学界的风尚，我又何必固守清贫和清高呢？事实真的只能如此吗？丁学良主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走向新生的途径，而作为单独的学者，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就只能无所作为、近墨者黑，甚至“与狼共舞”。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良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作为学者，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没有独立的人格，则不配称作“学者”；没有反抗世俗观念的勇气，则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他曾经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优厚的职位。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汤因比以拜占庭研究和近代希腊研

究的成果而获得教授职位。为了研究近代希腊人的生活,他前去近距离观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希土战争。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汤因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场战争希腊方面是非正义的,土耳其方面是正义的。然而,当时包括他的祖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支持希腊,欧洲人对中世纪土耳其人的“黄祸”依然心有余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国人辱骂成“奸细”,并被取消教书职位和研究基金。

汤因比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他指出:“在战争中,除了事物的真伪之外,正义与邪恶也是个问题,当然我还有教授的身份,又亲眼证实了实情,如实发表事实自不待言,我还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正义与邪恶的看法。”于是,汤因比发表文章说出了真相,表达了与英国官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为此,他辞去了教授的职位。这是一种可贵的“不一致”。今天中国数量多如牛毛的“教授”们,有几个敢于像汤因比这样做呢?

学术研究要告别虚妄、告别重复、告别空疏、告别“为稻粱谋”,就得从“半空中”回到“地下”踏实的实践中、从“纸上”回到民间鲜活的生活。并不是终身呆在象牙塔里才会做出学术成果来。美国著名教育家、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博耶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范式,确认学术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方面——

首先是探究的学术,大学应当通过科学研究来发展新的知识,拓展人类的知识领域。

其次是整合的学术,把科学发现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促进更多的跨学科交流和对话、发挥几个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综合优势,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急迫的需要。

第三是传播知识的学术,从事研究和出版著作,就意味着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别人。为了确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学术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交流,而且要与教室里的未来学者进行交流。

第四是应用知识的学术,即便是最形而上的哲学和宗教也可以通过知识的应用而变成个人的内在的洞察力。